

婚姻對身分認同之影響的初探^{*}

陳光輝^{**}

《本文摘要》

由於身分認同與省籍背景為台灣政治之主要分歧，本文探討人們是否因配偶省籍背景的異同而對其身分認同造成影響？哪些人的身分認同較容易受到其配偶省籍背景的影響？回答這些問題得以對成人期之社會化經驗與影響做一初步的評估。本文合併 TEDS 歷年全國性調查資料來評估婚姻與配偶省籍對於受訪者身分認同的可能影響，主要研究發現有：(一) 受訪者之原生家庭的省籍背景影響其身分認同與其配偶省籍背景；(二) 受訪者較可能與同樣省籍背景者結婚；(三) 受訪者的身分認同受到其配偶省籍的影響；(四) 女性的身分認同較可能受到配偶省籍背景的影響，但是高學歷女性有其獨立性，較不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五) 較高教育程度的男性之身分認同較有可能受到配偶省籍背景的影響。

關鍵詞：政治社會化、身分認同、婚姻、配偶

* 作者特別感謝鄭夙芬教授與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指正與諸多寶貴的修改建議。惟本文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polkhc@ccu.edu.tw。

壹、研究問題

政治社會化研究所處理的問題包括人們政治態度與行爲的形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影響的內容為何？是否因哪些特定因素而發生改變，或強化已形成的態度與行爲？既有研究將較多的焦點置於成人期之前的社會化因素及其產生的影響上，例如家庭、學校、同儕團體與居住地區等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3-25; Sears and Levy 2003)。造成此一現象的主要因素有二：一為理論上思考的影響：研究者多認為形塑人們政治態度與行爲的關鍵期為青春期與早期青年期，這個時期是人們邁入政治世界的初始階段，所有的全新政治經驗極為重要，並會留下深刻的影響，而且在這個階段形成的態度與行爲在未來的人生階段中將持續維持或強化，不易發生顯著的改變；二為資料的限制：欲完整檢視人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爲是否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發生變化，以及探究其變化原因，研究者須在很長一段時期中的不同時間點上，針對同一群研究對象蒐集資料進行追蹤與比較，這樣的研究設計需要相當龐大的研究資源，多數的研究者與團隊無法負荷。因此之故，既有研究多探索這些早期社會化因素對人們的影響，並已有相當成果的累積。在這些社會化因素當中，家庭與學校被認為是影響力最大的兩個主要因素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25-26)。

不管是學校或是家庭，既有研究較強調這兩個因素在人們早期社會化過程中的影響，對於成人時期的影響則較少深入探討。事實上，多數人的學校經驗在進入青年期前後一段時間後即告結束，學校教育不是成人時期的一個主要社會化因素。¹ 關於家庭在社會化過程中的影響，既有研究較強調的是父母親對於年輕子女態度與行爲的影響 (Jennings 2007)。相對的，家庭這個因素對於成人政治態度與行爲的影響則較少被觸及，成人時期的社會化經驗是我們較不熟悉的。由單身進入婚姻是人生階段的一大轉變，並對個人日後的長期發展有所影響，此一變動對於政治態度與行爲是否亦有所影響是評估家庭在成人期之社會化功能的適當途徑。

本文選擇以個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之身分認同來評估婚姻與配偶的可能影響，主要原因在於，身份認同是臺灣政治上的主要分歧，是影響民衆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爲的一項重要因素。就身份認同作為一個自變數而言，身分認同的差異與人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爲之間有著相當高程度的關聯（例如王甫昌 1998；吳乃德 1999；吳重禮與許文賓 2003；徐火炎 2005；盛杏媛 2002；陳陸輝與鄭夙芬 2003 等），台灣民衆的政黨認同、統獨立場與投票決定等態度與行爲均受到身份認同的影響（吳乃德 1993；林瓊珠 2009；劉明浩 2005）。此外，學者們也由不同面向來探討為何臺灣民衆出現認同分歧的現象。大致說來，日本殖民經驗的影響、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吳乃德 1992）、族群間不

¹ 此處並不排除早期學校教育所產生的持續性影響。

平等（省籍間不平等）的現象、反對黨的動員（王甫昌 1994）以及長期以來兩岸的隔離（張茂桂 1993）等因素都是造成臺灣民衆認同分歧的主要原因。

就個體層次而言，既有文獻指出省籍背景是造成台灣民衆在政治上產生分歧的一個重要因素（陳義彥與盛杏媛 2003），與身分認同之間有緊密的關係存在（劉明浩 2005），因此本文擬就省籍背景的角度來評估婚姻與身分認同之間的關聯性，並試圖推論兩者間的因果關係。楊婉瑩（2009）由性別不平等的角度評估台灣民衆的國族認同，檢視經驗資料比較不同的省籍婚配型態發現台灣男性以父親與丈夫的優勢角色影響子女與妻子的國族認同。換言之，成年男性為家庭政治社會化功能中的主要影響者。然而，在女性因經社地位提升獲得賦權後，男性在形塑國族認同上的優勢呈現降低的趨勢。本文延續相同的關切，由省籍背景的角度來檢視婚姻與配偶的影響，不同於楊婉瑩以世代進行男性優勢地位的評估，本文由個體教育程度的差異來評估配偶間相互影響的狀況，並以不同的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降低因個案數過少所導致在分析上的限制。

具體而言，在既有資料的限制下，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為，人們是否因配偶省籍背景的異同而對其身分認同造成影響？影響為何？哪些人較容易受到影響？藉由回答這些問題來對成人期之社會化經驗與影響做一初步的評估。此處之身分認同指的是台灣人與中國人認同的差異。由於理論思考上的差異，既有研究對於台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的問題給予不同的概念名稱，例如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國族認同等。釐清此一認同分類概念的內涵並非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作者認為當人們向他人表示自己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時，即在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也就是以台灣人或是中國人作為自己的身分，因此本文稱呼此台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的分類問題為身分認同。本文對此一變數進行探討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台灣民衆的政治態度與行為。

台灣民衆在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上有相當程度的分歧，在這過程中，原生家庭形塑了子女的身分認同，因此原生家庭之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間存有顯著的相關：外省籍民衆較傾向具有中國人認同；相較於外省籍民衆，本省籍背景的民衆則較可能傾向台灣人認同（劉明浩 2005）。然而，若與不同省籍背景者結婚，夫妻間的直接互動以及彼此共享的社會空間對各自的身分認同是否有所影響，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這個議題的探討除了對台灣的分歧政治有更進一步的理解之外，也對於政治社會化領域研究人們在習得政治態度後之穩定性與變動性的評估有所助益。政治社會化文獻當中一項主要的爭論為人們在早期社會化過程中所習得的態度與行為是否具有終身持續性 (life-span persistence) 的效果，或是社會化為一終身開放性 (lifelong openness) 的過程？若社會化過程為一終身開放性的過程，人們會因後續階段的新經驗而調整或改變既有的態度與行為，婚姻對於人們的政治態度應有著顯著的影響。反之，若早期習得的態度與行為具有終身持續性的影響，我們應

該觀察到的是早期社會過程中習得的態度與行為對於人生後續階段持續產生影響，人們的政治態度並不易因結婚對象而有所改變。在下文中，我們首先說明婚姻可能產生的影響並提出研究假設，接著，依序說明資料來源與變數測量、呈現資料分析結果並對研究發現進行討論。

貳、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婚姻之影響

在針對夫妻雙方所做的研究中發現，夫妻之間在政治態度與行為上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Hays and Bean 1992; Hays and Jones 1992; Lampard 1997; Plutzer and McBurnett 1991; Stoker and Jennings 1995; Zuckerman, Fitzgerald, and Dasović 2005)。此一致性可能導因於下列三種不同的狀況 (Stoker and Jennings 2005)：

(一) 選擇偏誤 (Selection bias) 的影響：若人們在選擇婚姻對象或選擇交往對象時，考慮對方的政治態度與自己的政治傾向是否有所衝突，而導致配偶間的一致性，即產生選擇偏誤的問題。若這個現象存在，我們可以發現配偶間在政治態度與行為上的一致性在婚姻生活開始前即已存在。婚姻生活可能的影響是其既有政治態度與行為的維持與強化。換句話說，配偶間在政治傾向上的一致性影響他們進入婚姻的原因，而非是婚姻生活所產生的影響。由於省籍與身分認同這兩個變數間的高度相關，選擇偏誤將導致人們選擇與同樣省籍背景及相同身分認同的對象組織家庭。在一個政治分歧嚴重的社會裡，政治因素即可能被視為擇偶的條件之一。吳乃德 (2002) 的研究中即發現這樣一個趨勢的存在：身分認同影響了是否接受省籍間通婚的態度。若我們所觀察到的夫妻間在政治態度與行為上的一致性是由於選擇偏誤，這說明的是早期社會化過程所產生的影響，而不是成人期後邁入婚姻所帶來的影響。也就是說，早期社會化過程中培養出來的政治傾向有相當持續性的作用，影響了成人期的配偶選擇。

(二) 配偶間的頻繁互動：在婚姻生活中，夫妻間通常有著相當密切的互動，因而產生了在婚姻內部的相互影響。夫妻間互動與溝通的內容不會僅限於日常生活事務上，通常也會觸及所處環境的相關公共事務上。可以想見的，同一家庭成員大多時候觀看共同的電視新聞進而有所討論，餐桌上所談及的話題也可能會包括對於政治人物與公共事務的想法，亦有不少家庭成員結伴一起至投票所投票。因此，對大多數的成年人而言，家庭是他們進行政治討論的一個主要場域之一，也是一個主要的政治資訊來源。如同多數夫妻因為彼此間的相互影響而有著共同的信仰或相同的生活習性，夫妻間也因頻繁的互動而影響了

彼此的政治態度與行爲，進而導致了在政治傾向的一致性。若此一夫妻間在政治態度與行爲的一致性存在，接下來進一步關注的問題是夫妻之間，何者對配偶的政治態度與行爲有著較大的影響力。傳統上政治被視爲是男性的領域，男性對於政治通常有著較高的興趣、知識與涉入 (Bennett and Bennett 1989; 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6, 203-209; Jennings 1998; Verba, Burns, and Schlozman 1997)。因此，在子女政治態度的形成過程中，父親通常有著相對較大的影響 (Rapoport 1985; Tedin 1974)。這樣的現象是否同樣存在於夫妻之間的相互影響上？我們想知道的是，若夫妻間政治態度與行爲的一致性是由於配偶間直接影響，那這個影響的方向爲何？究竟是男性影響大於女性？抑或是女性影響大於男性？若男性在家庭中有著對於政治資訊與傾向的優越性，那我們預期看到的是丈夫對於妻子的影響大於妻子對於丈夫的影響。

(三) 夫妻共享的社會空間：不同於上述配偶間因頻繁互動而直接影響了對方的政治行爲與態度，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相同的社會空間導致共同的外部因素同時對於夫妻雙方產生影響，進而形塑了他們一致的政治傾向。就大多數家庭而言，夫妻共同居住於一個社區之中、有著共有的經社地位、共同的親屬、一同往來的朋友。不論是居住區域、經社地位或是親友，均是提供人們政治資訊的來源，會影響我們對於政治事務的判斷。因爲這些共享的外部因素，夫妻受到相同的影響而產生相似的政治態度與行爲。在傳統觀念上，女性被視爲「嫁入」夫家，較爲常見的狀況是妻子必須「融入」夫家的生活。因此，夫妻間共同的社會空間並非是彼此間「公平」地共同創造出來的，而是女性配偶被帶入男性原本所屬的社會空間中而分享之。若此爲真，我們應該觀察到的是，在婚姻中，男性對於女性的影響力應該是較大的。

因爲上述三個因素的影響，我們預期夫妻間在政治態度與行爲上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由於傳統上男性在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優越性，我們也預期看到丈夫對妻子的影響大於妻子對丈夫的影響。然而，我們應留意的是個人的身分認同與其配偶省籍間的關係也可能同時受到本身省籍背景所影響。亦即，因爲原生家庭省籍背景的緣故而發展出特定的身分認同也同時較可能與特定省籍背景者結婚。本文主旨在於檢視受訪者原生家庭的省籍背景、受訪者配偶的省籍背景以及受訪者的身分認同這三個變數間的關係進而評估配偶省籍對於受訪者身分認同的可能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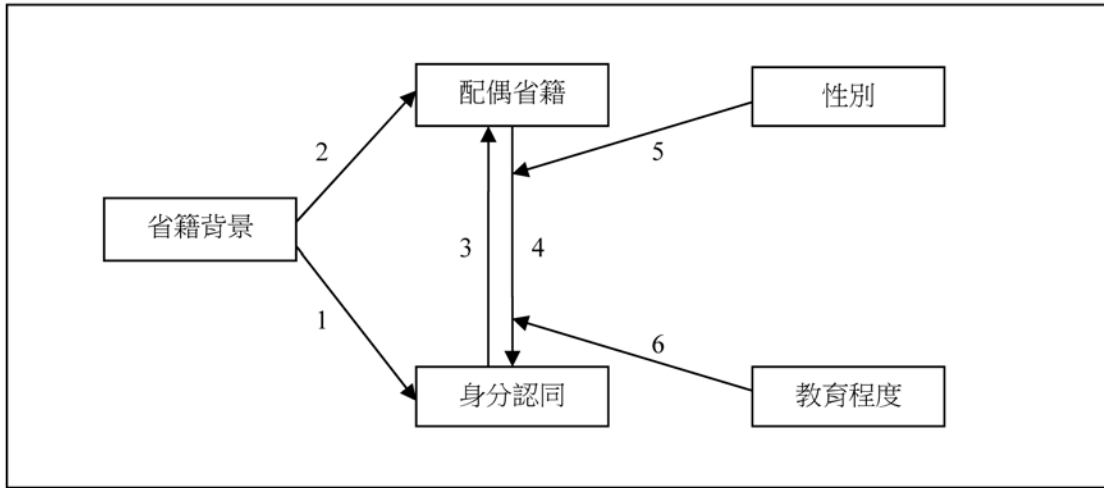
此外，我們也應留意的是丈夫對於妻子的影響應該不是一致地適用所有民衆身上。如同前述楊婉瑩 (2009) 之發現，因爲女性經社地位的提升、婦運的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變所導致性別權力間的改變，不同於年長世代，年輕世代男性的優勢地位已有所變動，年長男性較年輕男性有較大的影響力。不同於楊婉瑩以世代檢視性別間的差異，本文由個體出發，在長期以來男性較女性擁有較高權力地位的狀況下，探討婚姻中不同教育程

度者在身分認同上之相對影響力。一方面，由於教育程度與經社地位以及政治資源間的關聯性 (Nie, Junn, and Stehlik-Barry 1996)，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權力地位有所提升，在婚姻中不全然處於一個被影響的地位。另一方面，由男性處於優勢地位的角度而言，較高的教育程度可能對此男性優勢產生減緩的效果。教育程度較高者較能夠理解與實踐民主價值與規範 (Lawrence 1976; Prothro and Grigg 1960)，通常也對於不同背景者與不同意見有著較高程度的接受或是容忍 (Bobo and Licari 1989; Hyman, Wright, and Reed 1978; Nunn, Crockett, and Williams 1978)，因此較高教育程度的男性較可能理解與接受其配偶的身分認同，而對本身的身分認同有所影響。因此，我們預期在不同教育程度的配偶中，夫妻間的相對影響力是有所不同的：相對於教育程度較低者，高教育程度男性的影響力應該是較小的；反之，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應有相對較多的影響力，或是較不容易被配偶所影響。

可能影響夫妻間相互影響力的因素當然不僅限於教育程度這個變數，可能的因素還包括職業背景或社會階級等因素，夫妻間互動頻率與品質更是一項重要而直接的因素。由於資料上的限制，我們無法將可能的因素均納入分析範圍。本文選擇以教育程度為中介因素，主要的考量是教育在台灣社會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男性與女性間權力的改變導因於女性經社地位的提升以及婦運的發展，經社地位以及女權意識與教育程度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教育對於個人態度行為也有相當高的重要性。換言之，以教育程度進行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控制階級、收入、經社地位等因素的效果。

本文焦點在於評估婚姻與配偶對於身分認同的影響，也就是圖 1 中的關係 4，為了推論此一關係，我們同時考慮原生家庭省籍背景、性別與教育程度這三個變數，這幾項變數間的關係呈現於圖 1。依循前述說明以及這幾項變數產生影響的時間順序，我們首先描述原生家庭的省籍背景對身分認同（關係 1）以及對於配偶省籍（關係 2）的關係，再將省籍背景納入控制後，觀察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間的關係。接著，我們評估配偶省籍對於身分認同的影響（關係 4），但是，配偶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間的關聯可能是來自選擇偏誤，即身分認同對於配偶選擇的影響（關係 3），也可能是來自配偶省籍對於身分認同的影響（關係 4）。由於資料上的限制，我們並無適當的跨時資料來直接評估選擇偏誤所造成的影響，若選擇偏誤這個因素並無影響，直接排除這個因素是合理的做法，但這跟既有研究的發現並不吻合。² 因此，我們藉由控制性別與省籍背景來推論配偶省籍對於身分認同的影響（關係 5）。最後的部分，我們評估配偶對於身分認同是否在多數民衆中存有普遍性的影響，在控制省籍背景後，我們比較男性與女性是否因教育程度的差異，在與配偶的相互影響上有所不同（關係 6）。

² 吳乃德（2002）分析 1999 年的所蒐集的全國性調查資料發現在客家背景的受訪者中，身分認同與是否同意與外省籍民眾通婚這個問題的態度間並無明確關聯，但閩南背景者當中具有台灣人認同者則較不願意與外省籍民眾通婚。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1 變數關係說明

二、研究假設

綜合上述討論，考量到台灣政治分歧的狀況以及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間的緊密關係，我們提出下面的假設：一、配偶之省籍背景影響身分認同（圖 1 關係 4）：具體而言，結婚對象為本省閩南籍者較傾向台灣人認同，配偶為外省籍者較傾向中國人認同，若為客家人者則介於上述兩者之間。二、丈夫有著較大的影響力（圖 1 關係 5）：由於婚姻坡度的考量（張翰璧 2007, 2-3），亦即由於傳統上政治被視為男性的領域，丈夫在家庭內對於政治事務有著較大的發言權與影響力，再加上家庭共享的社會空間多來自男方原有之社會空間，因此，在配偶間政治態度的影響上，來自男性的影響應該是大於女性的。

三、男性的影響力較大並不是絕對的（圖 1 關係 6）：上述關於男性應有著較大的影響力是來自於傳統觀念中的性別與婚姻關係的思考。在考量到晚近以來女性主義興起的影響，導致了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與性別平等意識抬頭等因素，當女性擁有相當程度的資源與誘因而對政治事務有著較高程度的興趣與涉入時，男性的影響力並不一定大於女性。具體而言，當女性與男性在社會空間、政治知識、政治興趣、政治涉入等面向並無相當的差異時，我們預期女性對配偶政治傾向的影響力不小於男性的影響力。延續前述討論，我們將於本文中評估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受到婚姻與配偶影響的程度高低，具體的假設為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受訪者較不易受到婚姻與配偶的影響而改變身分認同。

參、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一、資料來源

欲適當地評估研究對象在個體層次受到婚姻與配偶之影響，而產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改變，研究者需要針對研究對象及其配偶在婚前與婚後進行觀察以便進行跨時的比較。若無法取得不同時間點上的資訊，研究者至少需要在同一時間點上配偶雙方的相關資訊，以檢視夫妻之間在政治態度與行為上的一致性，來推論婚姻所產生的可能影響。然而，我們目前並無如此的資料存在，供我們進行次級分析。既有的調查研究多將受訪者的人口變項以及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態度與行為納入問卷題目中，進行資料蒐集，雖然多數調查均將受訪對象的婚姻狀態納入調查範圍，但在受訪者配偶的部分，我們能夠得知的資訊相當有限。在政治類調查中，最常被問到的配偶資訊是省籍背景，配偶的教育程度與職業狀況亦常含括在內。然而，即便是配偶的省籍背景也常是簡化過後的資訊。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為例：就受訪者部分，我們分別詢問受訪者父親與母親是哪裡人，如此的問法考慮了通婚的可能性；但在配偶部分，則不考慮通婚狀況的影響，僅只是詢問配偶是哪裡人，無法較為精確地瞭解配偶原生家庭的省籍背景。

由於既有的資料無法提供我們關於受訪者配偶適當的資訊，進行精確評估婚姻與配偶對於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此類的研究尚屬少見。然而，考量到台灣民衆在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間的密切關聯，我們可以觀察人們是否因為結婚對象之省籍背景不同，在身分認同上有所差異，由配偶省籍背景的差異來評估婚姻的可能影響。此外，將性別予以控制後，我們可以評估究竟是男性或是女性的影響較大。然而，在處理與省籍背景有關的實證研究時，研究者面臨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個案數不足的問題。如前文所提到的，由於多數的台灣民衆為本省閩南籍，加上過去一段時間內人們尚未普遍接受不同省籍間的通婚（王甫昌 1993），參與調查之已婚受訪者多為本省閩南籍內的婚姻配對。在這樣的狀況下，其他省籍背景內的婚姻配對與省籍間通婚配對的個案數是相當有限的，因此研究者沒有足夠的個案數來進行適當的比較與執行較細緻的分析以評估婚姻的影響。

以歷年 TEDS 全國面訪資料為例，每個年度計畫的成功樣本數多介於一千至兩千個樣本之間，扣除了當中約莫四分之一的未婚受訪者，以及已婚受訪者當中約有六成五以上為本省閩南籍內的婚姻配對，所餘之其他省籍背景內（客家與外省）婚姻配對以及省籍間通婚者的樣本數均屬有限。若研究目的僅為呈現單一變數的分佈，這樣的樣本分佈與樣本數應是足夠的。但是若要將相關變數納入控制後進行分析，各種不同婚姻配對組合下的樣本

數則是不足的。

在上述限制下，本文將 TEDS 歷年全國性調查中獨立樣本之資料予以合併，以擴增可供分析的受訪者數目，來評估因婚姻對象省籍差異對身分認同的可能影響。我們納入的資料有：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 (TEDS2001，樣本數為 2,022)、2003 年民主化與政治變遷面訪案 (TEDS2003，樣本數為 1,164)、2004 年總統選舉面訪案 (TEDS2004P，樣本數為 1,823)、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 B 卷 (TEDS2004LB，樣本數為 1,258)、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 (TEDS2008L，樣本數為 1,240)、2008 年總統選舉面訪案 (TEDS2008P，樣本數為 1,905)。另有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 A 卷 (TEDS2004LA) 亦為全國性調查，但因該調查未詢問受訪者配偶之省籍背景，故未納入分析。將上述面訪案中的獨立樣本予以合併後，我們共計有 9,412 位受訪者的資料。³ 雖然前述每一次的調查均以排除外島地區之外的台灣地區所有合格選民為研究母群體，但考量到不同省籍背景者在分佈上的差距，本文僅針對當中來自本省閩南、本省客家以及外省籍三個主要的省籍背景者進行分析。此外雖然本文的主要分析資料來源為 TEDS 歷年全國性面訪資料，但是為了釐清台灣民眾對於省籍間通婚的態度，以利於分析 TEDS 資料來檢視本文所提之假設，我們也使用王甫昌 (2000) 所主持「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之調查資料進行次級分析，為求在各省籍中均有足夠的樣本數進行分析，該調查採分層抽樣架構，將樣本

³ 本文分析資料部分係採自下列幾筆：

1.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計畫：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TEDS2001)(NSC90-2420-H194-001)，計畫主持人為黃紀教授。
2. 「2002 年至 2004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 (II)：民國九十二年民主化與政治變遷民調案」(TEDS2003)(NSC92-2420-H001-004)，計畫主持人為朱雲漢教授。
3. 「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 (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TEDS2004P)(NSC92-2420-H031-004)，TEDS2004P 為針對 2004 年總統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黃秀端教授。
4. 「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 (IV)：民國九十三年立法委員選舉大型面訪案」(TEDS2004L)(NSC93-2420-H004-005-SSS)，TEDS2004L 為針對 2004 年立委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劉義周教授。
5. 「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II)：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TEDS2008L)(NSC96-2420-H002-025)，TEDS2008L 為針對 2008 年立委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朱雲漢教授。
6. 「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V)：民國九十七年總統選舉面訪案」(TEDS2008P)(NSC96-2420-H004-017)，TEDS2008P 為針對 2008 年總統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游清鑫教授。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 TEDS 網頁：<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進行膨脹後採用「長、短卷」法進行訪問，共計成功訪問 3,496 位受訪者。

在分析部分，我們首先依循圖 1 架構以描述統計的方式來檢視配偶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然而，如前所述，爲了增加樣本數以取得較爲精確的估測，本文將歷年六筆 TEDS 全國性面訪資料予以合併進行分析，構成屬於跨時間獨立樣本的合併資料 (pooled independent cross sections)。若本文所探討的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關係並未隨時間變動而有所變化，描述統計所呈現的結果應是有效的。但是，本文所分析的依變數身分認同自 1990 年代以來產生很大的變動：台灣民衆漸往台灣人認同與雙重認同的方向移動，而中國人認同者所佔比率日漸下滑，⁴ 僅以描述統計進行分析可能是不恰當的。因此，我們也使用二元勝算對數迴歸模型 (Binary logit model) 進行分析，在該分析中，我們納入資料蒐集年份的虛擬變數以控制依變數在不同時間點上分佈的差異，來釐清使用合併樣本的可能疑慮。此外，儘管本文的目的不在於對台灣民衆的身分認同進行完整的解釋，但使用二元勝算對數迴歸模型進行分析有助於我們納入較多的控制變數，以進一步釐清我們所關注的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間的關係。

二、變數測量

在變數測量方面，我們分別以受訪者對於下列題目的回答來測量受訪者父親與母親之省籍背景、配偶之省籍背景、受訪者之教育程度、受訪者之身分認同。受訪者父親省籍背景：「請問您的父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受訪者母親省籍背景：「請問您的母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配偶之省籍背景：(一)「請問您結婚了嗎？」(答案爲已婚或是同已婚者續問下題)(二)「請問您的配偶(先生或太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受訪者教育程度：「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什麼？」受訪者身分認同：「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爲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考量到原住民受訪者之個案數有限，不易進行分析，在大部分的分析裡，我們僅將父母親與配偶之省籍背景均爲下列三個類別之一者納入分析：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以及大陸各省市人。父母親均爲上述三種省籍背景者有 9,014 名受訪者，當中有 6,360 位爲已婚者，⁵ 未婚者有 2,134 位。父母親與配偶均爲該三種省籍背景者則有 6,207 人。在描述統

⁴ 請參見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10)。

⁵ 本文未將分居、寡居與離婚者納入分析，在於我們無法確認他們處於婚姻內生活的時間有多久，該婚姻內生活何時結束，我們無法判斷這些受訪者是否仍受到來自婚姻與配偶的影響。

計後半段的分析中，爲了將已婚受訪者之省籍背景對於身分認同與配偶省籍的影響予以控制，僅選取父母雙方均爲本省閩南籍之受訪者進行分析，受訪者人數爲 4,566 人。

本文以身份認同爲依變數，既有研究多依據原問卷題目設計將身分認同視爲一個三分類的類別變數進行分析，本文基於以下考量將之簡化爲二分類的變數：

一、在各項調查中，認同自己爲中國人的受訪者比率持續下降，因此歸類於中國人認同者的個案數過低，將導致推論以及模型係數推估的困難（蕭怡靖與黃紀 2010）。二、在政治動員的過程中，政黨多以「護台」、「救台」、「賣台」等訴求來動員選民，這些訴求將所有差異簡化爲「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清楚對立（徐火炎 2005, 39-40），在台灣民衆持續往台灣認同方向移動的狀況下，也形成台灣人與不是台灣人的差異，或是中國人與不是中國人的差異，也因此，若強調台灣人認同的狀況下，將「都是」與「中國人」這個類別併爲一類應是合理的。三、就經驗證據而言，近來研究陸續發現認爲自己是「中國人」與「都是」的民衆在政治行爲與態度上並未有顯著的差異，但台灣人認同者與雙重認同者之間則有顯著差異。例如，在政黨認同上，相較於雙重認同者，台灣人認同者顯著地較可能認同民進黨，但是認爲自己是中國人的民衆與雙重認同者之間並無顯著差異（陳陸輝 2000, 122）；在投票行爲上，以雙重認同者爲基準進行比較，台灣人認同者較可能投給民進黨籍候選人，但中國人認同者並未有顯著的不同（陳陸輝 2006, 54；蔡佳泓、徐永明與黃琇庭 2007, 17-18）；在民主價值態度部分，認同自己爲中國人的大學生與雙重認同者在民主價值上也沒有顯著差異（陳光輝 2010, 24-26）。符合前述的猜測，經驗研究的發現說明中國人認同者與雙重認同之間應有相當程度的替代性，但這樣的存在不存在於台灣人認同與雙重認同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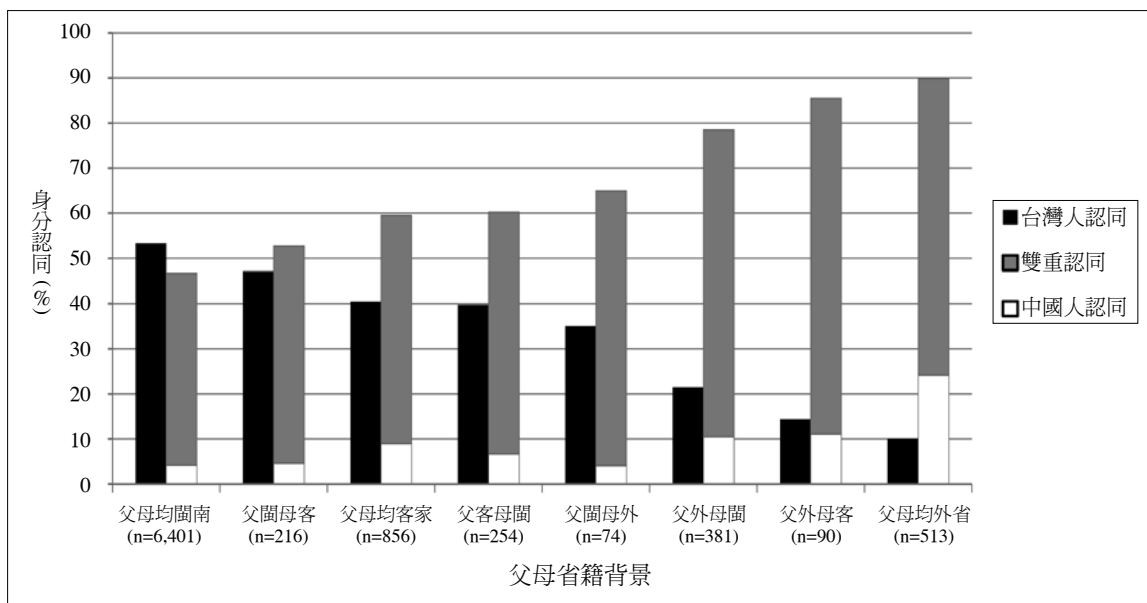
基於上述考量，本文在後續的描述與推論統計分析中，將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者合併進行分析。

肆、資料分析與發現

本文之主旨在於檢視與不同省籍背景者結婚是否造成在身分認同上的差異？若有此差異出現，影響的方向爲何？何種教育背景的人較容易受影響？是男性或是女性影響較大？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依循圖 1 裡各變數間的可能關係，我們先評估 TEDS 受訪者之原生家庭省籍背景與其身分認同及其配偶省籍的關聯性（關係 1 與關係 2），亦可藉此確認省籍背景是否造成身分認同與配偶省籍間的虛假相關。此外，我們亦評估身分認同對於配偶選擇的可能影響。之後，我們依上述問題順序將分析結果逐一呈現。

一、父母親省籍背景與受訪者身分認同

爲了檢視父母親省籍與受訪者身分認同間的關係，我們將受訪者依其父親與母親之省籍配對來比較他們的身分認同有無差異。圖 2 呈現該分析結果，該圖所呈現的是不同省籍配對家庭出身之受訪者選擇各類身分認同之比率。同時考慮受訪者父親與母親雙方省籍背景應產生九個類別的省籍配對，但是父親爲客家人母親爲外省人的受訪者僅有 18 人，個案數過少，因此我們未將此組受訪者納入比較。



資料來源：黃紀（2001）、朱雲漢（2003；2008）、黃秀端（2004）、劉義周（2004）、游清鑫（2008）。

圖 2 父母親省籍背景與受訪者身分認同

圖 2 中的各種原生家庭婚姻配對自左而右的排列順序是依照各組中台灣人認同之比率自高而低排列。在橫軸部分，父母親均爲本省閩南籍者在最左端，父母親均爲外省籍者在最右端，中間則爲客家與各種省籍間通婚的各種配對。這樣一個排序亦大略可適用於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兩個類別的排序上。有兩個較明顯的差異：一是在於父親爲外省人母親爲客家人中爲雙重認同者的比率高於父母均爲外省人的比率，這應是導因於父母均爲外省人之受訪者爲中國人認同之比率明顯高於其他各類婚配，因此在雙重認同上的比率稍微降低；二是父母均爲客家人以及父親爲客家人母親爲閩南人這兩個類別在中國人認同比率的排序上應向右移動，但這個差異不大。除了這兩個例外之外，我們觀察到最主要的一個趨勢是出身於外省籍家庭顯然與中國人認同或雙重認同有關，而出身於閩南籍家庭則相對較可能爲台灣人認同者。若父母雙方爲相同省籍背景者，此一趨勢更爲明顯，此類受訪者在

社會化過程中在家庭裡所接收到的資訊與經驗是較為一致的，因此分別有著較高程度的台灣人與中國人認同。相對地，來自客家籍家庭者就介於本省閩南籍與外省籍兩者之間，這樣一個趨勢與既有研究的發現相符。⁶

在圖 2 中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父母親對於形塑身分認同的相對影響力。依據上述關於閩南籍較可能偏向於台灣人認同而外省籍較可能傾向中國人認同或是雙重認同的趨勢，我們得以評估來自省籍間通婚家庭的受訪者在總體層次上父親與母親的相對影響力。就客家人與閩南人之間的通婚家庭來比較，父親為閩南人母親為客家人之受訪者認同自己為台灣人之比率高於父親為客家人母親為閩南人的受訪者，在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上則是相反的趨勢。因此，在配偶為客家籍的狀況下，父親為閩南籍相對於母親為閩南籍較可能影響子女台灣人認同的形成，同時也較能降低子女為中國人認同或雙重認同的可能。若比較閩南籍與外省籍的通婚配對，同樣的趨勢再次出現：配偶為閩南籍的狀況下，父親為外省人的受訪者比母親為外省人的受訪者較可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雙重認同者；配偶為外省籍的狀況下，父親為閩南人相對於母親為閩南人較可能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子女。整體而言，來自父親省籍背景的影響是高於來自母親省籍背景的影響。這個發現與傳統觀念上認為政治是屬於男性的領域是相符的，縱然在家庭內母親通常與子女間有較多的互動，但是因為父親在政治領域上擁有較多的影響力或因為家庭內職司分工的關係，父親對於子女身分認同有較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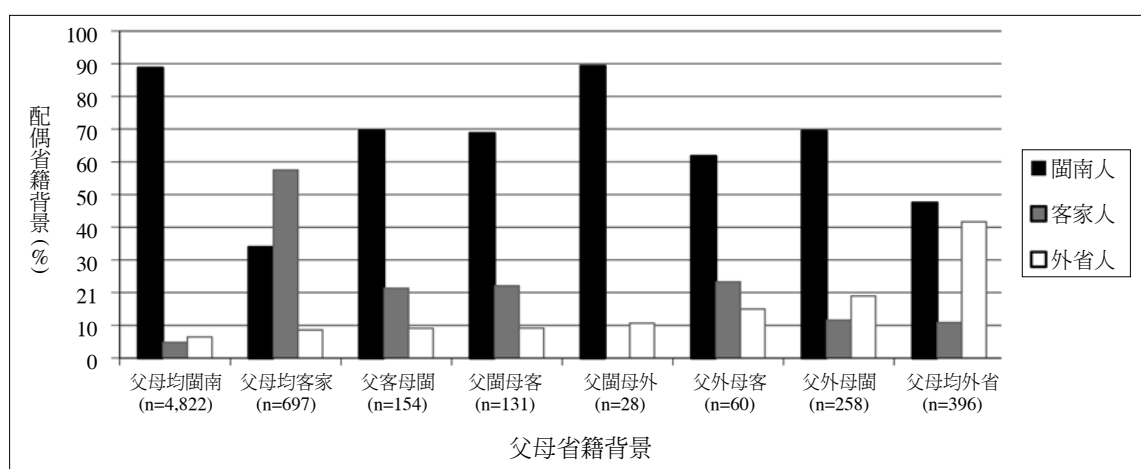
二、省籍背景與配偶省籍的關聯

造成配偶的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間虛假相關的另一個條件為圖 1 中的關係 2，即受訪者的省籍背景對其配偶省籍的影響。亦即，由於族群間社會距離或是態度上的差異，出生於不同省籍家庭者較可能與特定省籍背景者結婚，此一差異進而影響了受訪者身分認同與其配偶省籍間的關聯。圖 3 呈現已婚受訪者的父母省籍配對與其配偶省籍間的關係：橫軸為受訪者原生家庭的不同省籍配對之類別，縱軸則為受訪者配偶省籍背景的比率。橫軸各類別自左而右的排列是依照受訪者配偶為外省籍之比率由低至高進行排序。

就三組來自省籍內婚姻家庭的受訪者而言，均有相當高比率的受訪者與相同省籍背景者結婚：來自閩南籍家庭的受訪者中，當中超過八成八的人與閩南籍者結婚；來自客家背

⁶ 既有研究多將受訪者分為本省與外省兩個類別進行比較，未將客家人予以單獨分類進行比較（例如王甫昌 1993），但是吳乃德在 2002 年的分析中將客家人予以單獨分類，顯示在自我認同（即本文中的身分認同問題上）等態度上，客家人的態度是介於閩南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吳乃德 2002），王甫昌（2001）也有類似發現。

景者最可能與客家人結婚 (57.4%)；來自外省家庭者雖最可能與閩南籍者通婚，⁷ 但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與外省籍者結婚。此外，來自通婚家庭的受訪者也較可能與其父或母之相同省籍背景者結婚。整體而言，圖 3 的分佈清楚地呈現了原生家庭之省籍背景與配偶省籍背景的關聯。綜合圖 2 與圖 3 的資訊，身分認同與配偶省籍間所呈現的關聯很可能是導因於受訪者省籍此一外部因素的影響。下文將檢視身分認同與配偶省籍間兩者的關係，並將原生家庭省籍背景的影響納入控制後進一步檢視此關聯。



資料來源：黃紀（2001）、朱雲漢（2003；2008）、黃秀端（2004）、劉義周（2004）、游清鑫（2008）。

圖 3 父母親省籍背景與受訪者配偶省籍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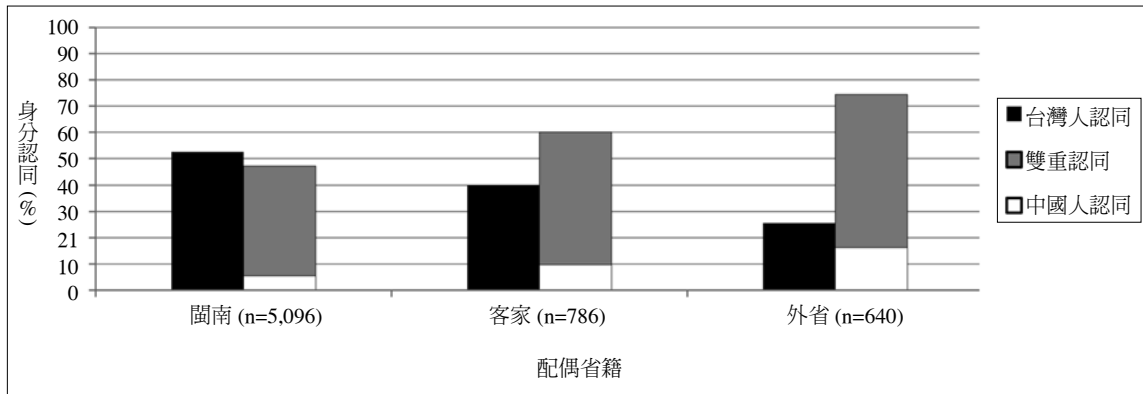
三、婚姻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的關聯

為檢視配偶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之間是否有所關聯，我們依據配偶省籍背景將所有受訪者分為閩南、客家與外省三個類別，並比較各類受訪者為各種身分認同的比率，結果呈現於圖 4。在這個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配偶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之間有所關聯：配偶為本省閩南人之受訪者中多數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是配偶為外省人之受訪者的兩倍以上；配偶為外省人者則最可能具有中國人認同或是雙重認同。圖 4 中各類受訪者同時含括配偶雙方為省籍內婚姻與省籍間通婚者，如同前述分析所示，省籍背景本身同時影響了身分認同與擇偶對象，因此膨脹了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間的關聯性。因此，我們依照受訪者父親之省籍背景予以分類，評估三個省籍背景組之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間的關係，結果置於附錄一，呈現與圖 4 相似的關係。⁸ 上文討論婚姻的影響時已提到，我們所觀察到關於

⁷ 這部分有可能導因於早期人口結構上的差異，即第一代外省民眾多為男性而與閩南籍女性通婚所造成的影響（王甫昌 1993；1994）。

⁸ 本省閩南籍與外省籍受訪者之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間的關係相當清楚：配偶為外省人與較高比率的中國人認同有關聯，配偶為本省閩南人與較高比率的台灣人認同有關聯。客家籍受訪者部

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間的關聯，可能導因於不同的原因：省籍背景的外部影響、選擇偏誤、配偶間的互動與夫妻共享的社會空間。在未進一步釐清這些因素間對於身分認同之影響的差異前，我們觀察到的僅是身分認同與配偶省籍間的關聯性。



資料來源：黃紀（2001）、朱雲漢（2003；2008）、黃秀端（2004）、劉義周（2004）、游清鑫（2008）。

圖 4 配偶省籍背景與受訪者身分認同

四、選擇偏誤的評估

為了控制圖 1 中省籍背景對於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關係 1 與關係 2）的影響，受訪者之省籍背景須予以控制，但考量到個別省籍背景受訪者個案數的狀況，我們僅將父母親為閩南人之受訪者納入接下來的分析。此外，相對於客家人，本省閩南人與外省人之間在身分認同上的差異較為明顯，在這部分的分析裡我們聚焦於配偶為這兩個省籍背景的閩南籍受訪者，來探討配偶省籍背景對受訪者身分認同的影響。在評估婚姻與配偶的影響之前，選擇偏誤的影響須先予以釐清。圖 1 中選擇偏誤（關係 3）所帶來的干擾，導致我們無法直接地以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間的關聯程度來評估婚姻與配偶的影響（關係 4）。

由於 TEDS 歷年研究多以選民行為與態度為研究焦點，當中並無受訪者對於省籍間通婚問題的態度，因此我們重新檢視於 1999 年「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研究」所蒐集的資料，以評估選擇偏誤的干擾（王甫昌 2000）。分析結果呈現於附錄二，不論是以前輩或母親的省籍為依據，三類身分認同的閩南籍受訪者均同意女兒與閩南人結婚，不同身分認同者間並未有顯著差異。但是當論及是否同意讓女兒嫁給客家人與外省人時，身分認同與通婚態度之間有顯著的相關：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者較不贊成女兒與客家人及外省人通婚，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則較同意女兒與客家人及外省人通婚。⁹ 在控制了省籍背景後

分則較不明顯，這可能是導因於測量的問題，即我們並未明確區分本省客家人與外省客家人之間的差異。

⁹ 本文此處試圖釐清的是受訪者本身的身分認同是否影響了本身對於配偶的選擇，特別是在省籍

(關係 1 與關係 2)，選擇偏誤 (關係 3) 確實在部分受訪者身上呈現。對於如何控制這個選擇偏誤的影響以評估配偶與婚姻對於身分認同的影響，一個可能的做法是，假設未婚與已婚者的選擇偏誤是等量的，我們以未婚者為控制組，藉由比較圖 3 中三組受訪者與未婚受訪者在身分認同上的差異來推估配偶省籍所帶來的影響。然而，將所有受訪者分為已婚與未婚兩組進行比較，當中最大的差異可能不是來自婚姻的影響，而是來自年齡及其成長過程中不同政治經驗的影響。若以本文分析之所有 TEDS 受訪者的出生年來看，未婚者的平均出生西元年次為 1976.4，而已婚者的平均出生西元年次為 1955.4，兩者之平均年齡相差超過 20 年。因此，以未婚者為控制組進行比較來評估婚姻的影響並不是一個適合的做法。

若選擇偏誤 (關係 3) 的影響並無性別上的差異，我們可以藉由比較男性與女性在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間關聯性的強弱，來辨識配偶省籍對於男性與女性受訪者個別的影響 (關係 4)。亦即，當控制了省籍背景之後，我們所觀察到的身分認同與配偶省籍間之關聯性為選擇偏誤與配偶省籍兩項影響力之合，當男性與女性在選擇偏誤上的影響力約莫相等，但男性與女性在身分認同與配偶省籍間的關聯性上卻有差異時，這個性別上的不同應當是來自於配偶省籍影響力的差異。若為此，我們可由觀察到的身分認同與配偶省籍間的關聯性來評估配偶省籍影響力的大小，也同時間接地確認了配偶省籍對於身分認同的影響。

選擇偏誤 (關係 3) 在男性與女性之間是不是等量？這可由人們能否接受省籍間通婚的態度來進行評估。我們分析上述「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研究」之調查資料，比較閩南籍男性與女性在身分認同與通婚態度這兩個變數上的關係是否有所不同，結果呈現於表 1。¹⁰ 這個分析所要檢視的是不同身分認同的閩南籍男性與女性，在是否同意女兒與外省籍者結婚這個問題上有無差異存在。不論是男性或是女性，一個共同的趨勢是：中國人認同者較同意與外省籍者通婚，台灣人認同者較不同意，雙重認同者介於兩者之間。相較之下，不論身分認同為何，男性在通婚態度的分數上均較女性為低，較同意與外省籍通婚，但是這個差異相當小，距離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尚有一段距離。因此，我們可以同意上述關於選擇偏誤的假設 (關係 3)，選擇偏誤存在但無性別上的差異，因此，男性與女性

背景上的考量，王甫昌 (2000) 所蒐集之調查資料則以是否同意女兒與不同省籍背景者通婚的方式來檢視受訪者的態度，兩者之間有所差異。然而，我們若考慮性別在台灣社會中的差異，特別是女性普遍被視為「嫁入」夫家的狀況，亦即女性是處於一個較為劣勢的地位，受訪者在回答是否同意女兒與其他省籍背景者通婚時，應有更多的顧慮，因此應更能測量出受訪者的通婚態度。

¹⁰ 此處將父親為閩南人之受訪者納入分析，不論是以父親或母親之省籍背景進行認定，均呈現相似的分析結果。

在身分認同與配偶籍貫之間的關聯性大小可以反映出男性與女性在配偶省籍上的影響力強度（關係 4）。若男性在身分認同與配偶省籍間的關聯性大於女性在同一關係上的關聯性，那麼我們可以說男性對於妻子身分認同的影響大於女性對於丈夫身分認同的影響。

表 1 閩南籍受訪者之身分認同與通婚態度關係的性別差異

通婚態度 (1-5)*		台灣人認同	雙重認同	中國人認同
男性	平均數	2.34	2.19	2.12
	樣本數	846	232	83
	標準差	0.815	0.703	0.632
女性	平均數	2.35	2.22	2.18
	樣本數	883	221	65
	標準差	0.786	0.767	0.682
男性與女性平均數之差		-0.01	-0.03	-0.08
檢定值		df=1727, t=-0.25, p=0.803	df=451, t=-0.336, p=0.737	df=146, t=-0.591, p=0.555

資料來源：王甫昌（2000）主持之「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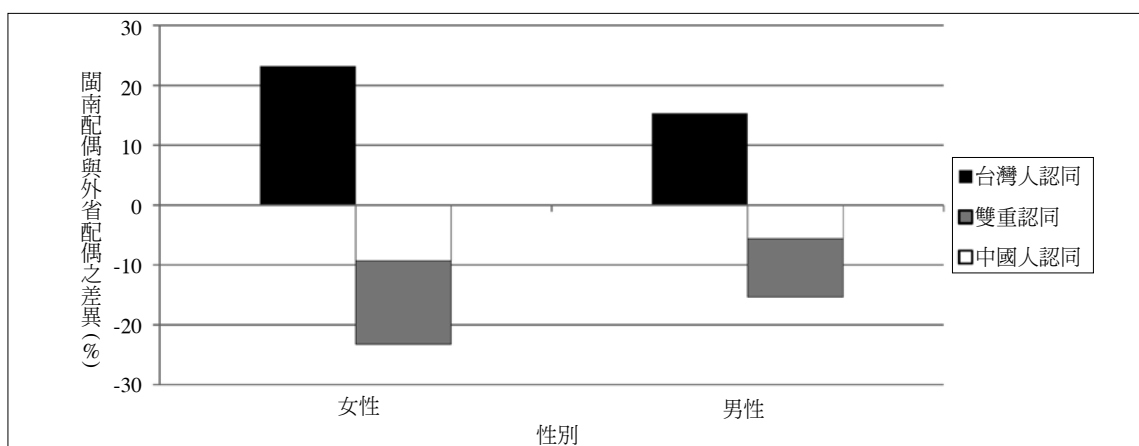
說明：* 原始問卷題目為：「如果您有女兒要嫁給外省人，您心裡願不願意？」選項及轉錄分數分別為非常願意 (1)、願意 (2)、還算願意 (3)、不願意 (4)、非常不願意 (5)。

爲了進一步確認配偶省籍對於受訪者之身分認同是否有所影響，我們先比較男性與女性在配偶籍貫與身分認同間的關聯性。這個問題也同時回答哪些人比較容易受影響？除了性別之外，我們也從教育這個因素來考量。如同上文提到的，基於個案數的考量以及爲了控制受訪者本身省籍背景此一外部因素的干擾，即爲了排除圖 1 中省籍背景對身分認同的影響（關係 1）以及省籍背景對配偶省籍的影響（關係 2），我們接下來的分析僅納入父母親均為閩南人的受訪者。

五、誰較可能受影響：閩南籍受訪者性別的比較

就性別而言，如同在分析受訪者原生家庭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間的關係時所發現的，父親的影響應該大於母親的影響，在夫妻之間，也可能是丈夫對妻子的影響大於妻子對於丈夫的影響。我們分別呈現男性與女性受訪者在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間的關係進行比較，對此假設進行評估。由於客家籍者在身分認同的態度上介於本省閩南籍與外省籍者之間，因此我們未將配偶為客家籍者納入分析。在評估性別的影響上，我們首先將所有閩南籍受訪者依照性別以及其配偶是否為本省閩南籍或外省籍分為四個群組：男性與閩南人結婚、男性與外省人結婚、女性與閩南人結婚、女性與外省人結婚，之後我們比較這四組受訪者

分別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是雙重認同者的比率。根據上述四組在各個身分認同上的比率，我們計算在性別上的差異。以台灣人認同為例，我們首先以男性與閩南人結婚受訪者為台灣人認同的比率減去男性與外省人結婚受訪者為台灣人認同的比率，我們用此一比率來估測男性受訪者在台灣人認同上受到配偶省籍之影響量，我們亦以同樣方法來計算女性受訪者在台灣人認同上受到配偶省籍之影響量，同樣的方法亦運用在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上。因此我們共有男性與女性在身分認同上受到配偶省籍差異之影響的估計量，結果呈現於圖 5。



資料來源：黃紀（2001）、朱雲漢（2003；2008）、黃秀端（2004）、劉義周（2004）、游清鑫（2008）。

圖 5 閩南籍受訪者之配偶省籍背景差異與身分認同間的差異：性別的比較

上圖最左方的第一個黑色長條顯示女性受訪者因結婚對象為閩南人或是外省人在台灣人認同比率上的差異是 23.2 個百分點，此差異是由配偶為閩南人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率 (59.4%) 減去配偶為外省人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率 (36.2%)。此一比率高於代表男性的右方黑色長條所呈現的 15.3 個百分點 (54.6%-39.3%)，顯示閩南籍女性因配偶為閩南人而有較高比率的台灣人認同。同樣地，比較分別代表雙重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兩個灰色與白色長條，左邊的方塊面積均略大於右邊的方塊。此一差異顯示，不論男性配偶省籍背景為何，在總體層次上，女性受訪者較可能有著與其男性配偶省籍相關聯的身分認同：相較於配偶為外省籍的男性受訪者，配偶為外省籍的女性受訪者有較高比率的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相較於配偶為本省籍的男性受訪者，配偶為本省籍的女性受訪者有較高比率的台灣人認同。此一差異顯示，在總體層次上，女性受訪者在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這兩個變數間的關聯性是高於男性的。如同圖 1 所示，在控制了省籍背景之後，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這兩個變數間的關聯是由選擇偏誤（關係 3）與配偶省籍（關係 4）所形成的，即為這兩個關係之總合值，圖 5 則顯示女性受訪者在此一總合值是大於男性的。依循前文關於

男性與女性在選擇偏誤上是等量的說明，即男性與女性在這個關係上是相等的，因此男性與女性在此一總合值上的差異是來自於配偶省籍的影響。女性在此一總合值上大於男性是導因於配偶省籍之影響在女性受訪者身上有較大的作用。因此，在身分認同這個問題上，女性是較容易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¹¹ 這個發現也間接說明了婚姻與配偶省籍對於身分認同的影響應該是存在的。

六、誰較可能受影響：閩南籍受訪者教育程度的比較

就教育程度而言，我們的預期是教育程度較高者有著較充分的資源與資訊，因此較不容易在婚後因為配偶或所處環境而有所改變。合理來說，我們應當使用夫妻雙方的教育程度來計算出相對教育程度，確認是男性或是女性有著較高的教育程度，婚姻內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可能是影響對方的那一方。然而，我們並無受訪者配偶的學歷背景資料，因此我們僅以受訪者本人的教育程度高低來評估其受到配偶省籍背景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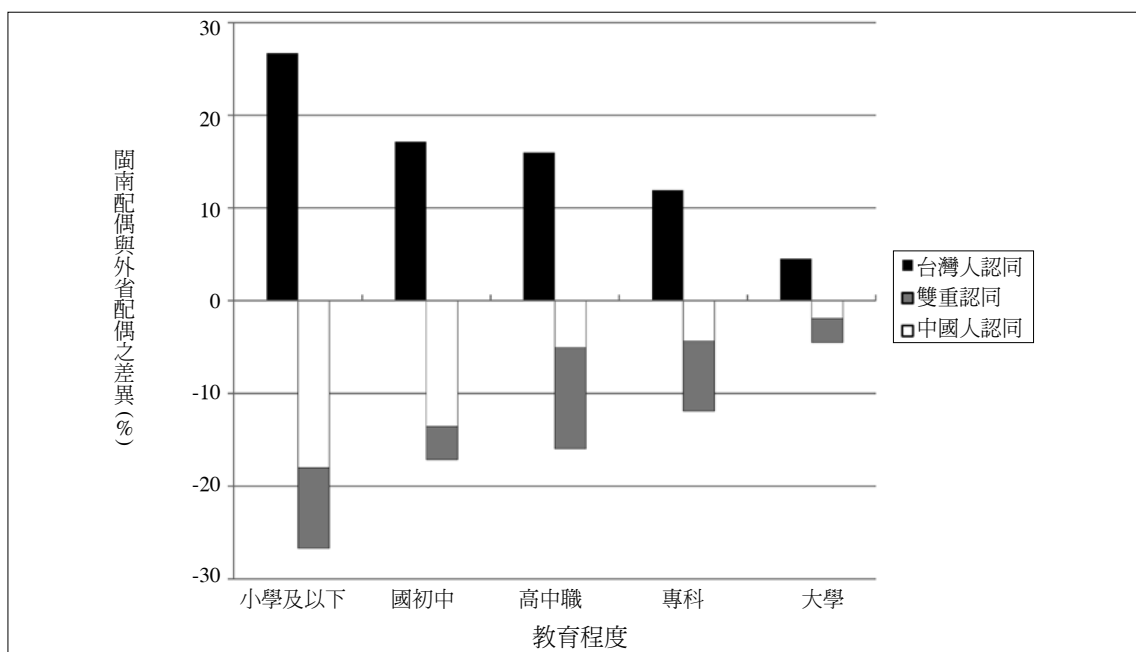
我們依循前述的方法來比較不同教育程度者，因為配偶為閩南籍或是外省籍在各類認同上的差異，結果呈現於圖 6。圖中的黑色（台灣人認同）與白色（中國人認同）長條的面積隨著受訪者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縮小，呈現的趨勢與我們的假設相符。灰色方塊所代表的雙重認同並未完全呈現一個特定的趨勢，這可能是導因於我們聚焦於閩南籍配偶與外省籍配偶間的比較，這兩個省籍背景與雙重認同間的關係不若這兩個省籍背景與台灣人及中國人認同間的關係密切。此外，雙重認同與中國人認同間又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這可能干擾了圖中灰色方塊之面積與教育程度間的關係。整體而言，教育程度愈高的受訪者較不可能受其配偶省籍背景的影響而改變身分認同。

¹¹ 我們可以用下列簡式來予以呈現：

$$\text{男性（關係 3）} + \text{男性（關係 4）} < \text{女性（關係 3）} + \text{女性（關係 4）}$$

$$\text{因為 男性（關係 3）} = \text{女性（關係 3）}$$

$$\text{所以 男性（關係 4）} < \text{女性（關係 4）}$$



資料來源：黃紀（2001）、朱雲漢（2003；2008）、黃秀端（2004）、劉義周（2004）、游清鑫（2008）。

圖 6 閩南籍受訪者之配偶省籍背景與身分認同間的差異：教育程度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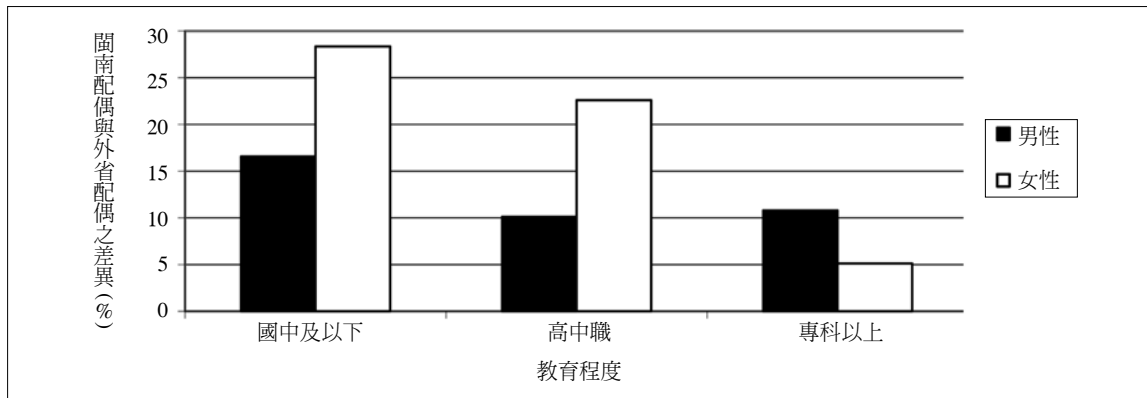
七、誰較可能受影響：閩南籍受訪者性別與教育程度的比較

上面的分析用來評估哪些人的身分認同較容易受到配偶與婚姻的影響，我們分別由性別與教育程度的角度，從總體的層次來評估是不是女性以及低教育程度者較容易受到婚姻與配偶的影響，而調整或改變其身分認同。整體而言，我們的假設是被肯定的：女性與低教育程度者較可能因為配偶省籍而影響其身分認同。接著，我們同時考慮性別與教育程度來評估，我們亦採用上述比較不同性別以及不同教育程度之閩南籍受訪者的方式，來評估配偶省籍在身分認同上的影響。考量到個案數的限制，我們將教育程度的歸類簡化為三類，但此轉錄並未對研究發現有所影響，結果呈現於圖 7。

教育程度影響了受訪者受到來自配偶省籍背景的影響程度，但在男性與女性受訪者身上呈現了不同的趨勢。就女性而言，由圖 7a 與圖 7c 的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變動差異程度來看，低教育程度者有最大程度的差異，隨著受訪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婚姻與配偶在身分認同上的影響隨之降低，教育程度對於女性受訪者在政治態度的獨立性或是穩定性上有著相當清楚的影響。然而，我們並未在男性受訪者身上看到完全相同的趨勢，相較於中高教育程度者，低教育程度者較可能因其配偶為閩南人或是外省人而有較高比率的台灣人認同或是中國人認同，但中等與高等教育程度的受訪者並未有明顯的差異，男性受訪者並未因受較高程度之教育而有較高的態度穩定度。女性受訪者之身分認同是否受到配偶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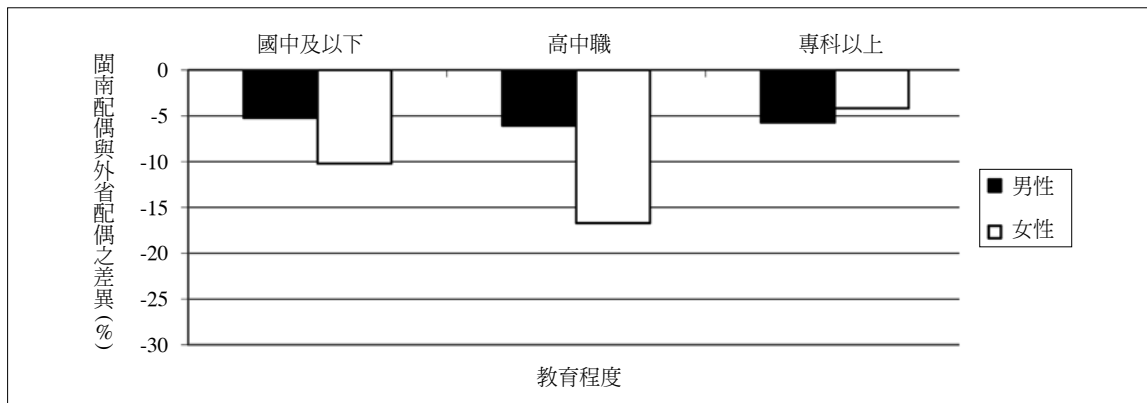
籍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但在男性受訪者身上，教育程度的中介作用則較為有限。

此外，我們看到了在不同教育程度中，性別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圖 7 顯示不論是哪一个認同類別，在較低與中等教育程度受訪者部分，代表女性的白色長條面積均大於代表男性的黑色長條，中低教育程度女性確實較容易因為配偶為外省籍而有較高比率的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或是配偶為閩南籍而有較高比率的台灣人認同。相對地，中低教育程度男性則較不可能因為配偶省籍背景而有特定的身分認同。因此，這邊看到的在性別上的差異為：女性均較男性可能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然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中，我們發現了相反的趨勢：代表男性的黑色長條面積均大於代表女性的白色長條，在三個認同類別中，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均較不容易因為配偶的省籍而發生改變。這個差異與傳統上認為在家庭中男性在政治事務上有較大的影響力的說法是不同的，我們看到的是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後，其身分認同較不容易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這個發現有兩個可能的解釋：首先，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有著較多的政治資訊與政治興趣，因此在政治態度上有著較高程度的獨立性與穩定性；其次，如同圖 7 所顯示，較高教育程度的男性在身分認同上的差異不僅大於同樣教育程度的女性，在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上的差異也大於接受中等教育的男性，表示較高教育程度的男性確實較有可能因為配偶省籍背景的差異而調整其政治態度，意味著較高教育程度的男性較有可能接受不同的看法與資訊而願意調整既有的態度，因此在總體上有較高的變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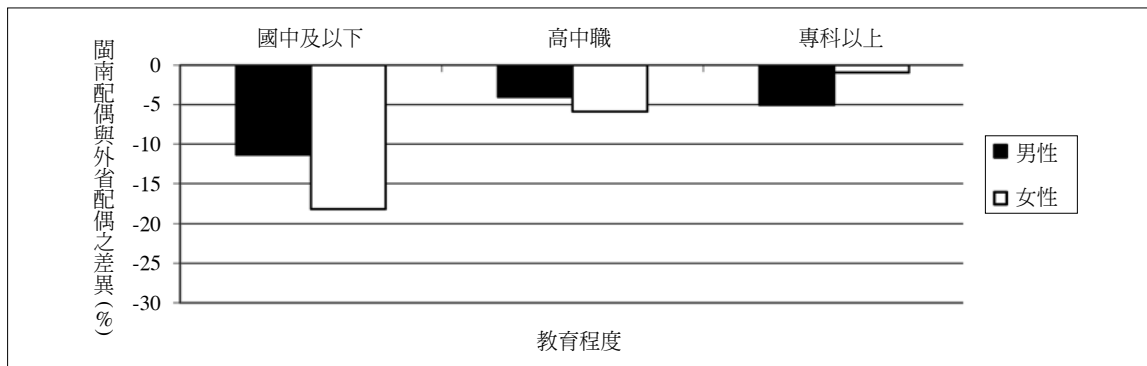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黃紀（2001）、朱雲漢（2003；2008）、黃秀端（2004）、劉義周（2004）、游清鑫（2008）。

圖 7a 閩南籍受訪者的台灣人認同：配偶省籍、教育程度與性別的差異



資料來源：黃紀（2001）、朱雲漢（2003；2008）、黃秀端（2004）、劉義周（2004）、游清鑫（2008）。

圖 7b 閩南籍受訪者的雙重認同：配偶省籍、教育程度與性別的差異



資料來源：黃紀（2001）、朱雲漢（2003；2008）、黃秀端（2004）、劉義周（2004）、游清鑫（2008）。

圖 7c 閩南籍受訪者的中國人認同：配偶省籍、教育程度與性別的差異

八、配偶省籍背景對身分認同的影響

前述分析依照圖 1 中各變數間的關係以描述統計的方式逐步呈現在總體層次上配偶省籍背景對受訪者身分認同的可能影響，各項假設也獲得支持。然而，如同前文所提，因為不同省籍背景婚姻配對樣本數上的限制，本文合併歷年 TEDS 全國性面訪資料進行分析，這個狀況下各年度間資料的差異必須納入考量，前述描述統計分析尚未適當處理這個問題。此外，在前述的分析中，我們並未考慮受訪者年齡的影響。就本文的研究對象而言，不同年齡者出生於不同時代背景，他們在身分認同上呈現不同的分佈，對於不同省籍間通婚的態度也可能有差異存在，因此我們也將受訪者的出生年此依變數納入下面的二元勝算對數迴歸模型分析。由於係數估計上受到樣本數的限制，我們無法將所有可能影響身分認同的相關變數均納入模型分析中，我們僅將本文分析架構內所含括的變數與因應合併資料考量之變數納入模型中。

本文聚焦於配偶省籍對於受訪者身分認同的影響，但此一關係也受到受訪者性別與教育程度的影響，我們無法在單一模型中同時呈現受訪者性別、教育程度與配偶省籍這三個變數的交互作用對身分認同的影響，因此在下面的二元勝算對數迴歸模型分析中，我們先將所有樣本依據其性別與教育程度分為六組樣本進行分析以利結果的呈現與解讀，分析結果呈現於表 2。在係數的詮釋上，係數為正值表示越可能為台灣人認同者，若為負值表示越可能為雙重認同者與中國人認同者。

資料蒐集年這幾個虛擬變數多在教育為中下程度的樣本中呈現顯著的正面影響，這說明了在過去十年中，台灣民衆整體上呈現往台灣人認同方向移動的趨勢主要是來自於教育為中下程度之民衆的轉變，教育程度較高者則未呈現清楚的變動趨勢。然而，在 2008 年的資料中，不論性別以及教育程度為何，台灣人認同呈現顯著的提升，這可能導因於當年度立委及總統大選的動員效果，認同在該年度選舉中同時為候選人及政黨之訴求，因此導致不同背景者往台灣人方向移動。就受訪者的出生年而言，在不同的模型中，年齡對身分認同並未有清楚一致的影響。在控制了資料蒐集年以及受訪者的出生年後，父母親省籍背景對受訪者的身分認同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特別是外省籍父母親的影響是相當一致的。

表 2 身分認同的二元勝算對數迴歸模型分析

性別 教育程度	男性					
	國中小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及以上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資料年度 (2001 年 =0)						
2003 年	0.909***	0.197	0.389	0.254	0.240	0.293
2004 年	0.628**	0.182	0.364	0.231	0.064	0.248
2005 年	0.405*	0.198	0.422 [#]	0.252	0.255	0.274
2008 年	0.895***	0.162	0.539**	0.207	0.643**	0.216
出生年	-0.016**	0.005	-0.006	0.006	-0.013 [#]	0.007
父親省籍 (客家 =0)						
閩南人	0.536 [#]	0.315	0.626 [#]	0.332	0.428	0.353
外省人	-0.196	0.483	-1.095 [#]	0.560	-1.901***	0.525
母親省籍 (客家 =0)						
閩南人	-0.122	0.315	-0.543 [#]	0.320	0.277	0.366
外省人	-1.923***	0.534	-1.478 [#]	0.810	-0.890	0.693
配偶省籍 (客家 =0)						
閩南人	0.158	0.231	0.365	0.253	0.690*	0.324
外省人	-0.382	0.405	-0.195	0.337	0.266	0.392
常數	-0.076	0.263	-0.579	0.407	-1.202*	0.513
	n = 1,331 LR X ² (11) = 134.79 p < 0.001 Pseudo R ² = 0.0724		n = 869 LR X ² (11) = 73.41 p < 0.001 Pseudo R ² = 0.0620		n = 882 LR X ² (11) = 157.57 p < 0.001 Pseudo R ² = 0.1405	
性別 教育程度	女性					
	國中小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及以上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資料年度 (2001 年 =0)						
2003 年	0.329 [#]	0.183	0.557*	0.245	0.451	0.322
2004 年	0.588***	0.166	0.712**	0.217	0.453	0.276
2005 年	0.411*	0.184	0.514*	0.247	0.382	0.318
2008 年	0.656***	0.146	0.881***	0.195	0.700**	0.246
出生年	-0.020***	0.004	0.008	0.008	-0.003	0.009
父親省籍 (客家 =0)						
閩南人	-0.076	0.291	0.213	0.294	1.162***	0.380
外省人	-1.358**	0.494	-0.694 [#]	0.376	-0.141	0.442
母親省籍 (客家 =0)						
閩南人	0.140	0.290	0.260	0.294	0.063	0.348
外省人	0.262	0.598	0.083	0.497	-0.456	0.514
配偶省籍 (客家 =0)						
閩南人	0.640**	0.199	0.288	0.241	-0.198	0.284
外省人	-0.781**	0.271	-0.453	0.337	-0.431	0.354
常數	0.429 [#]	0.236	-1.817***	0.468	-1.518**	0.585
	n = 1,643 LR X ² (11) = 137.13 p < 0.001 Pseudo R ² = 0.0634		n = 938 LR X ² (11) = 67.13 p < 0.001 Pseudo R ² = 0.0529		n = 699 LR X ² (11) = 68.92 p < 0.001 Pseudo R ² = 0.0754	

資料來源：黃紀 (2001)、朱雲漢 (2003; 2008)、黃秀端 (2004)、劉義周 (2004)、游清鑫 (2008)。

說明：[#]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就本文所關注配偶省籍對身分認同的影響而言，男性樣本與女性樣本呈現了相反的趨勢。在男性受訪者部分，配偶省籍僅在教育程度較高的樣本中出現顯著的影響：妻子為閩南人者較可能有台灣人認同，教育程度較低的男性之身分認同不受到妻子省籍背景的影響。在女性受訪者部分，教育程度較高的兩組樣本中，丈夫省籍背景並無顯著影響，丈夫省籍背景對於教育程度最低的女性則產生顯著影響：丈夫為閩南人較可能產生台灣人認同，若丈夫為外省人則較可能是雙重認同或是中國人認同。與前述描述統計結果一致：配偶省籍的影響取決於性別與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較高的男性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較可能受配偶省籍背景影響而發展出相對應的身分認同。

本文的分析發現父母親的省籍背景仍持續對受訪者的身分認同有所影響，這與楊婉瑩（2009）的發現一致。楊婉瑩以控制世代的方式進行比較，分析發現父親省籍背景對於認同的影響力在年輕世代中呈現下滑的趨勢，但是丈夫對於妻子的影響力在年輕世代中卻呈現不減反增的狀況。不同於楊婉瑩以世代進行比較，本文以教育程度進行控制，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男性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較可能受配偶省籍背景影響的現象。¹² 由於年輕世代之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就年輕世代而言，男性較可能受到配偶的影響，女性則較不容易受到丈夫的影響，這部分與楊婉瑩的發現卻有所差異。這個差異可能來自於資料來源的不同，本文資料為歷年 TEDS 面訪調查資料之合併，跨越較長的一段時間（2001 年至 2008 年），楊婉瑩以 2003 年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此外，這個差異也有可能源自世代劃分標準所造成的影響，未來應進一步瞭解兩者研究發現差異之來源，並進一步釐清性別、教育程度以及世代這幾個因素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的關係。

伍、結論與討論

本文合併 TEDS 歷年全國性面訪資料來評估婚姻與配偶省籍對於受訪者在身分認同上的可能影響，研究假設大致均受到研究發現的支持，簡述如下：一、受訪者原生家庭的省籍背景影響其身分認同與其配偶省籍背景；二、受訪者的身分認同受到其配偶省籍的影響；三、女性的身分認同較可能受到配偶省籍背景的影響，但是高學歷女性有其獨立性，較不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四、較高教育程度的男性之身分認同較有可能受到配偶省籍背景的影響。

就政治社會化理論中關於人們政治態度在青春期與早期青年期形成後是否可能產生變動的問題來看，婚姻會對人們的政治態度有所影響，因此本文的發現較為支持人們在成年

¹²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高教育程度女性反而有可能影響丈夫的認同，然而，本文乃是控制教育程度來檢視受訪者是否受配偶影響，無法直接檢視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對配偶的影響，因此這個說法尚屬推測。感謝評論人的提醒與建議。

後的政治態度是可能持續發生變動的。此外，就性別而言，我們發現高學歷女性在政治態度上有其獨立的影響力，甚至是大於男性配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之比率持續升高的狀況下，我們預期在未來的政治中，女性將有更大的影響力出現。

王甫昌（1993）在 1990 年代初期的研究中，發現早期本省籍與外省籍間之通婚對其身分認同等態度有所影響，但這樣的影響多發生在本省籍女性往其外省籍配偶之方向產生移動，並非是一個雙向的影響，與本省籍女性結婚的外省男性在相關態度上並未有明顯的改變。在本文的分析中，我們也發現配偶為外省籍的女性受訪者確實也較可能有中國人認同或是雙重認同，這部分的發現與王甫昌的發現是一致的。然而，在進一步將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予以控制後，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省籍女性已不太受到外省籍配偶的影響而發展出中國人或是雙重認同，相對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省籍男性較可能因配偶省籍背景而發展出相對應的身分認同來。由於台灣高等教育已經大幅擴充，而且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並不低於男性，因此前述通婚所造成對本省女性的單向影響應已大幅降低，這對族群關係的發展應是一個較為正面的訊息。

然而，以上分析雖指出在教育程度大幅提升的狀況下，在婚姻中的男性優勢已呈現修正，形成女性影響力提升而男性影響力下滑的狀況，整體趨勢是朝向性別間的平等。然而，若考慮到父母親對於子女身分認同的影響，整體而言，父親對於形塑子女認同態度的影響力是大於母親的影響力。女性民衆的身分認同，均受到父親省籍背景的不同影響，但母親省籍背景卻未產生任何顯著的影響。就此而言，性別間的差異是依然存在的。在夫妻間的相互影響此一水平關係上，我們看到了性別間的差異縮小，但在親子間此一垂直關係上，男性的影響力仍是較大的。¹³ 水平間的差異縮小後，是否能夠影響並改善垂直關係上的差異，是研究者可以持續關注的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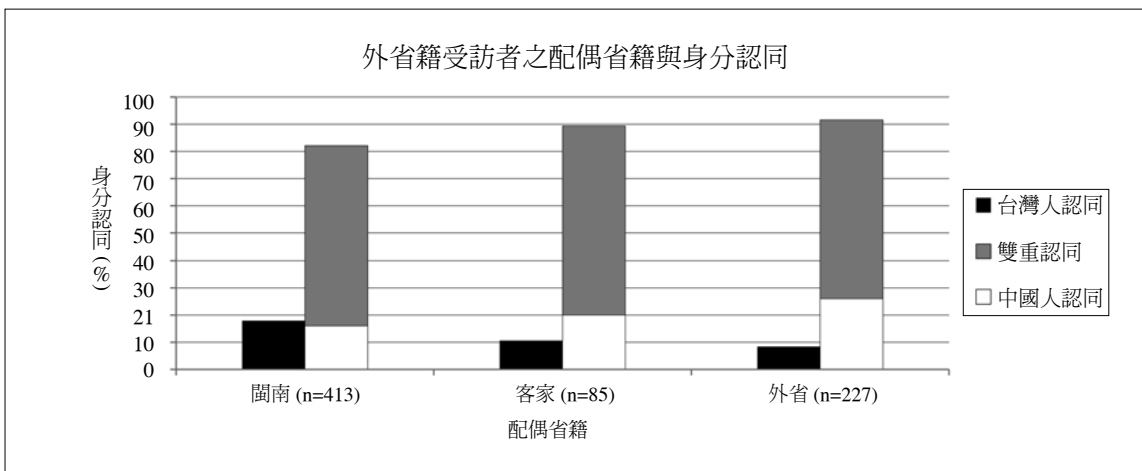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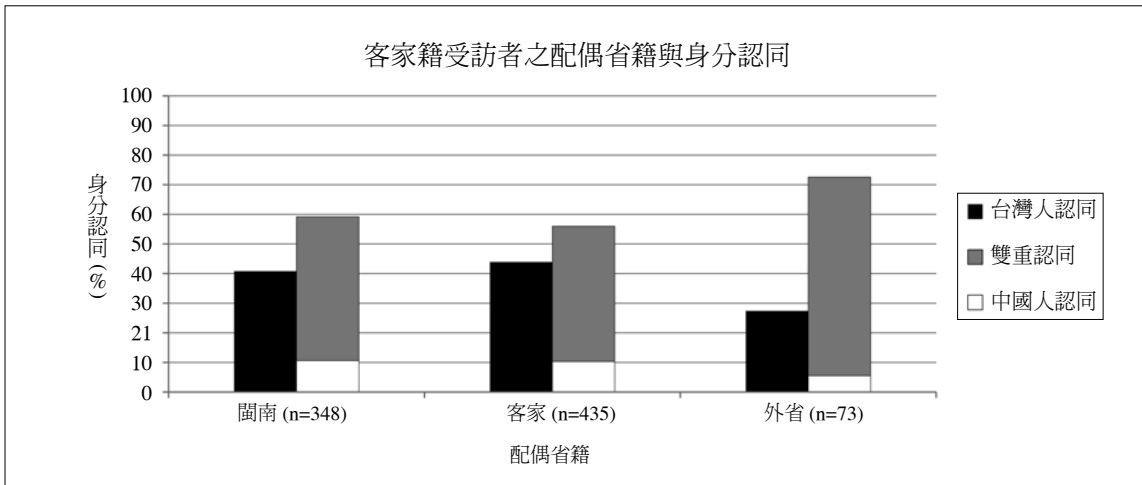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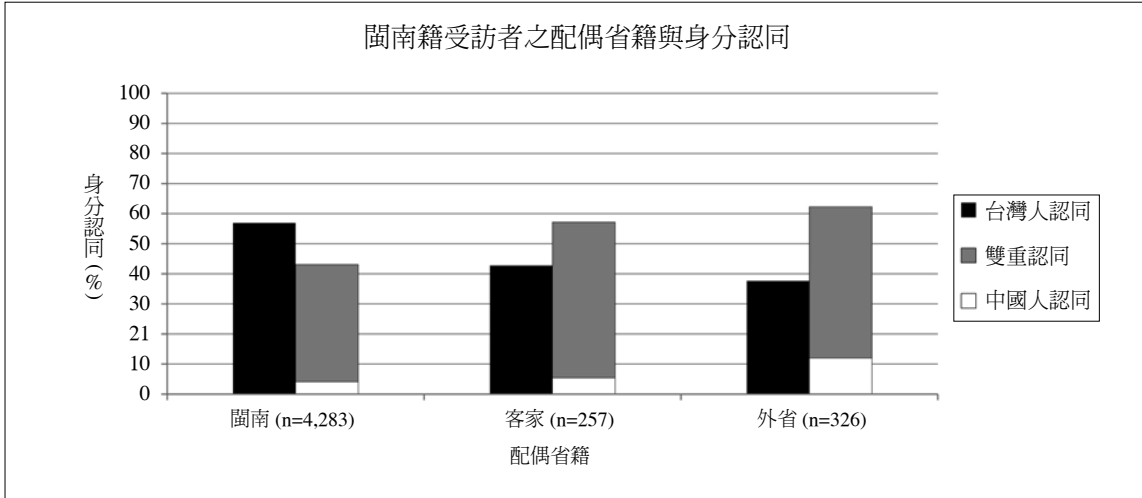
本文最大的限制在於，研究者並無受訪者配偶在不同時間點上的相關資訊。對於未來關於探討婚姻與配偶之影響的研究，在無法蒐集跨時資料的限制上，我們建議應針對夫妻雙方同時進行資料的蒐集。若有夫妻雙方的資訊，我們得以進行配對比較確定配偶間在政治態度與行為上的一致性程度為何、有哪些因素影響了夫妻間政治傾向的一致性。此外，若能同時對配偶雙方進行資料的蒐集，我們可以進一步評估夫妻間的一致性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來自於夫妻間的直接互動抑或是導因於其所共享的社會空間。此外，我們亦可藉由這樣的研究設計來對夫妻間的相互影響力進行評估，瞭解成人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變動是如何產生的。

* * *

投稿日期：99.11.11；修改日期：100.01.31；接受日期：100.07.02

¹³ 感謝本文匿名審查人提供此一觀點以豐富研究發現之討論。

附錄一、不同省籍背景者之配偶省籍與身分認同



資料來源：黃紀（2001）、朱雲漢（2003；2008）、黃秀端（2004）、劉義周（2004）、游清鑫（2008）。

附錄二、本省閩南籍受訪者之身分認同與通婚態度 (1999)

身分 認同	通婚態度*	母親為本省閩南籍			父親為本省閩南籍		
		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台灣人	平均數	1.82	2.49	2.33	1.81	2.50	2.34
	樣本數	1,841	1,791	1,795	1,776	1,727	1,729
	標準差	0.53	0.92	0.80	0.54	0.91	0.80
都是	平均數	1.82	2.40	2.16	1.80	2.39	2.21
	樣本數	536	524	524	465	453	453
	標準差	0.53	0.87	0.73	0.52	0.85	0.74
中國人	平均數	1.81	2.36	2.09	1.80	2.38	2.15
	樣本數	186	181	182	152	146	148
	標準差	0.54	0.95	0.65	0.48	0.94	0.66
		df=2, 2560	df=2, 2493	df=2, 2498	df=2, 2390	df=2, 2323	df=2, 2327
		F=0.03	F=3.39	F=15.18	F=0.12	F=3.66	F=8.74
		p=0.9674	p=0.0340	p<0.001	p=0.8896	p=0.0260	p<0.001

資料來源：王甫昌（2000）主持之「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

說明：* 原始問卷題目為：「如果您有女兒要嫁給 _____ 人，您心裡願不願意？」選項及轉錄分數分別為非常願意 (1)、願意 (2)、還算願意 (3)、不願意 (4)、非常不願意 (5)。

參考文獻

I. 中文部分

- 王甫昌，1993，〈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1): 231-267。
- (Wang, Fu-chang. 1993. "The Consequences of Ethnic Intermarriages: The Impacts of Intermarriages on Ethnic Assimil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6(1): 231-267.)
- ，1994，〈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6: 43-96。
- (-----, 1994. "Cause and Patterns of Ethnic Intermarriages among the Hokkien, Hakka, and Mainlanders in Postwar Taiwan: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6: 43-96.)
- ，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2: 1-45。
- (-----, 1998. "Ethnic Consciousness, Nationalism, and Party Support: Taiwan's Ethnic Politics in the 1990s." *Taiw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 1-45.)
- ，2000，〈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研究執行報告〉，計畫編號：NSC88-2412-H001-012，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 2000. "A Report of the Social Survey on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aiwan." NSC88-2412-H001-012.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2001，〈台灣的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載於《社會轉型與文化變貌：華人社會的比較》，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黃紹倫主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 2001. "Ethnic Intermarriages and Ethnic Relationship."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ies*, eds. Siu-kai Lau, Po-san Shirley Wan, Ming-kwan Lee, and Shao-lun Huang. Hong-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 朱雲漢，2003，〈2002年至2004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民國九十二年民主化與政治變遷民調案〉，計畫編號：NSC92-2420-H001-004，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Chu, Yun-han. 2003.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3." NSC92-

- 2420-H001-004.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 2008, 《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II) :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調查》, 計畫編號: NSC96-2420-H002-025, 台北: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 2008.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5-2008(III):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2008." NSC96-2420-H002-025.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吳乃德, 1992, 〈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臺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4: 33-61。
- (Wu, Nai-teh. 1992. "Party Sup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Social Cleavag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4: 33-61.)
- , 1993, 〈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及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 載於《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 張茂桂主編, 台北: 業強。
- (-----, 1993. "Ethnic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Sup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thnic Political Theories in Taiwan." In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ed. Mau-kuei Chang. Taipei: Ye-Qiang.)
- , 1999, 〈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 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 《台灣社會學研究》, 3: 53-85。
- (-----, 1999.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deologies: Generation Difference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mong Taiwan's Voters." *Taiw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3: 53-85.)
- , 2002, 〈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 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 《台灣社會學》, 4: 75-118。
- (-----, 2002. "Identity Conflict and Political Trust: Ethn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aiwanese Sociology* 4: 75-118.)
- 吳重禮、許文賓, 2003, 〈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 以 2001 年台灣地區選民政黨認同的決定因素為例〉, 《政治科學論叢》, 18: 101-140。
- (Wu, Chung-li, and Wen-pin Hsu. 2003. "Who are Partisans and Independents? Determinants of Party Identifications of Taiwan's Voters in 2001."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 101-140.)
- 林瓊珠, 2009, 〈台灣民衆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與統獨立場穩定與變動之分析〉,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國際學術研討會, 1 月 17-18 日, 台北: 台灣大學。

- (Lin, Chiung-chu. 2009. "The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y and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Position in Taiwan." Presented at the Eighth TED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ipei.)
- 徐火炎，2005，〈認知動員、文化動員與台灣 2004 年總統大選的選民投票行為：選舉動員類型的初步探討〉，《台灣民主季刊》，2(4): 31-66。
- (Shyu, Huo-yan. 2005. "Cognitive Mobilization, Cultural Mobiliza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aiwan's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lectoral Mobilizatio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2(4): 31-66.)
- 張茂桂，1993，〈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載於《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張茂桂主編，台北：業強。
- (Chang, Mau-kuei. 1993. "Ethnic Issues and Nationalism." In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ed. Mau-kuei Chang. Taipei: Ye-Qiang.)
- 張翰璧，2007，《東南亞女性移民與台灣客家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
- (Chang, Han-pi. 2007.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 Wives and Taiwan Hakka Communit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盛杏媛，2002，〈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一九九〇年代的分析〉，《選舉研究》，9(1): 41-80。
- (Sheng, Shing-yuan. 2002. "The Issue Taiwan Independence vs. 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aiwan: An Analysis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9(1): 41-80.)
- 陳光輝，2010，〈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的比較〉，《台灣民主季刊》，7(4): 1-46。
- (Chen, Kuang-hui. 2010. "Democratic Experienc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Comparing Two Genera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7(4): 1-46.)
-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7(2): 109-141。
- (Chen, Lu-huei. 2000.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Electorate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7(2): 109-141.)
- ，2006，〈政治信任的政治後果——以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台灣民主季刊》，3(2): 39-62。
- (-----. 2006.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Trust: The Case of 2004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3(2): 39-62.)
- 陳陸輝、鄭夙芬，2003，〈訪問時使用的語言與民眾政治態度間關聯性之研究〉，《選舉研

- 究》，10(2): 135-158。
- (Chen, Lu-huei, and Su-feng Cheng. 2003. "The Study of Correlations among Interview Language Usage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0(2): 135-158.)
- 陳義彥、盛杏潏，2003，〈政治分歧與政黨競爭：二〇〇一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10(1): 7-40。
- (Chen, Yin-yan, and Shing-yuan Sheng. 2003. "Political Cleavage and Party Competition: An Analysis of the 2001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0(1): 7-40.)
- 黃紀，2001，《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計畫：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計畫編號：NSC90-2420-H194-001，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Huang, Chi. 2001.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2001." NSC90-2420-H194-001.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黃秀端，2004，《2002年至2004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計畫編號：NSC92-2420-H031-004，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Hawang, Shio-uan. 2004.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2002-2004(III):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04." NSC92-2420-H031-004.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0，〈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站：<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htm>，檢索日期：2010年11月1日。
- (Election Study Cente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0. "Trends in Core Political Attitudes among Taiwanese." Election Study Center Website. <http://esc.nccu.edu.tw/english/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htm> [accessed November 1, 2010].)
- 游清鑫，2008，《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V)：民國九十七年總統選舉面訪案》，計畫編號：NSC96-2420-H004-017，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Yu, Ching-hsin. 2008.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NSC96-2420-H004-017.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楊婉瑩，2009，〈民族主義的父系家／族譜的繁衍與衰落：台灣個案的經驗〉，《人文及社

- 會科學集刊》，21(2): 291-323。
- (Yan, Wan-ying. 2009. "The Reproduction and Decline of the Patrilineal Genealogy of Nationalism: A Taiwan Case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1(2): 291-323.)
- 劉明浩，2005，〈不同省籍民衆國家認同的持續與變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Liu, Ming-hao. 2005. "The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劉義周，2004，〈2002年至2004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V)：民國九十三年立法委員選舉大型面訪案〉，計畫編號：NSC93-2420-H004-005-SSS，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Liu, I-chou. 2004.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2002-2004(IV):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 2004." NSC93-2420-H004-005-SSS.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蔡佳泓、徐永明、黃琇庭，2007，〈兩極化政治：解釋台灣2004總統大選〉，《選舉研究》，14(1): 1-31。
- (Tasi, Chia-hung, Yong-ming Hsu, and Hsiu-tin Huang. 2007. "Bi-Polarizing the Politics: Explaining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4(1): 1-31.)
- 蕭怡靖、黃紀，2010，〈2008年立委選舉人票之分析：選民個體與選區總體的多層模型〉，《台灣政治學刊》，14(1): 3-53。
- (Shiao, Yi-ching, and Chi Huang. 2010. "District Ballot of the 2008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A Multilevel Model."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4(1): 3-53.)

II. 外文部分

- Bennett, Linda, and Stephen E. Bennett. 1989. "Endur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Interest."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7: 105-122.
- Bobo, Lawrence, and Frederick C. Licari. 1989.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Testing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Sophistication and Target Group Affect."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3: 285-308.
- Delli Carpini, Michael X., and Scott Keeter.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ys, Bernadette C., and Clive S. Bean. 1992. "The Impact of Spousal Characteristic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ustral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6(4): 524-529.
- Hays, Bernadette C., and F. L. Jones. 1992. "Class Identification among Australian Couples: Are Wives' Characteristics Irreleva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3(3): 463-483.
- Hyman, Herbert H., Charles R. Wright, and John S. Reed. 1978. *The Enduring Effects of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ennings, M. Kent. 1998. "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Journal of Politics* 60: 954-973.
- , 200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eds. Russell J. Dalto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1974.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mpard, Richard James. 1997. "Party Political Homogamy in Great Britai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1): 79-99.
- Lawrence, David G. 1976. "Procedural Norms and Tolerance: A Reassess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 80-100.
- Nie, Norman H., Jane Junn, and Kenneth Stehlik-Barry. 1996. *Education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in Americ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unn, Clyde Z., Hary J. Crockett, and J. Allen Williams. 1978. *Tolerance for Nonconformi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Plutzer, Eric, and Michael McBurnett. 1991. "Family Life and American Politics: The 'Marriage Gap' Reconsidered."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1): 113-127.
- Prothro, James, and Charles Grigg. 1960.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Bases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22: 276-294.
- Rapoport, Ronald B. 1985.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K Response Patter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9: 198-208.
- Sears, David O., and Sheri Levy. 2003. "Childhood and Adult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eds. 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and Robety Jarv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oker, Laura, and M. Kent Jennings. 1995. "Life-Cycle Transi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Marria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2): 421-433.
- , 2005.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fluence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n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ersonal Networks as Contexts for Political Behavior, ed. Alan S. Zuckerm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Tedin, Kent L. 1974.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on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Adolesc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1579-1592.

Verba, Sidney, Nancy Burns, and Kay L. Schlozman. 1997. "Knowing and Caring about Politics: Gender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59: 1051-1072.

Zuckerman, Alan S., Jennifer Fitzgerald, and Josip Dasović. 2005. "Do Couples Support the Same Political Parties? Sometimes: Evidence from British and German Household Panel Surveys." In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ersonal Networks as Contexts for Political Behavior*, ed. Alan S. Zuckerm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Marriage on Self-Identity

Kuang-hui Chen *

Abstract

Given that ethnicity and identity are the principal factors of political cleavage in Taiwa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ether individuals'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ie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spouses' ethnic background? If so, whose ident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shaped by the intens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n a marriag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helpful to resear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s during adulthood. This article analyzes pooled survey data from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and the main findings are: (1) Ethnic background affects the respondents' self-identities. (2) Respondents tend to marry within their ethnic group. (3) Respondents' self-identitie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spouses' ethnic background. (4) Although females' self-identities are generally affected by their spouses' ethnicity, the best-educated females' self-identities are less likely to be changed after getting married. (5) The best-educated males' self-ident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shifted after getting married than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Keyword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self-identity, marriage, spous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